

# 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

## ——顾颉刚的“教授自由”之路

◎ 史海勾沉 □ 周维强

顾颉刚一生勤奋,很多领地都留下了辛勤耕耘所收获的累累果实。但顾颉刚终其一生,主要的还是以史学教授为主业,图书馆学家、出版家、编辑家、历史文化通俗读物作家都属于副业,而最初他在北京大学,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是助教,然后一跃而从初级教职直升正教授。

从事业的角度可以问:顾颉刚是怎么成名的呢?换个更世俗更功利的角度来提问则是:顾颉刚是如何跳上教授的平台并实现“教授自由”的呢?

民国九年(1920),顾颉刚28岁。这一年6月,顾颉刚完成在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的学业,他的高等教育经历也就止步于此。在学期间,顾颉刚听过章士钊的逻辑课、胡适的中国哲学课(后改为中国哲学史)、康宝忠的伦理学课、李石曾的生物学课等。顾颉刚北大毕业留校被聘为助教,职事定为校图书馆编目。1921年1月,顾颉刚除了继续在北大图书馆的职事,又受马裕藻所邀兼管国文系参考室。1921年11月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开办,沈兼士是主任,顾颉刚任国文学门助教。后来有两年顾颉刚因事离开北京。1923年9月初,沈兼士邀顾颉刚回京工作,12月13日顾颉刚回到北京,重返北大研究所国文学门做助教。顾颉刚在北大做助教前后六七年,忽然到了1926年8月直接坐上了“史学研究教授”的大位,这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1926年7月,顾颉刚在北大助教的位置上获得了厦门大学聘书:厦门大学研究所导师及国文系教授。当时北京高校欠薪严重,顾颉刚5月8日的日记说自己“在京穷困至此”,得到这份聘书,自然高兴,8月5日全家离京。顾颉刚8月21日到达厦门,8月25日厦大文科主任林语堂就来和顾颉刚说要更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顾颉刚后来说自己当时“骇问其故”,自己都吓了一大跳。林语堂的解释是:“《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这是顾颉刚后来1975年3月的日记里补记的。而与顾颉刚回到厦大的潘家洵,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则仍照北大例给予讲师头衔。

厦门大学能够招致北京的学者南来,主要是当时北京高校欠薪严重,奉系军阀张作霖又入关,恰好创校者陈嘉庚给了厦大一笔钱,这样林语堂受校长林文庆之聘于1926年5月南下厦门大学做文科主任,邀集沈兼士、鲁迅、张星烺、陈万里、顾颉刚来厦大一起办国学研究院。顾颉刚8月25日写信给陈垣,信里也向陈垣约稿,说厦大“富于资财”,出版经费每年1万元,如果是“名著”还可以“增加预算”。但这些都未能做成,没过多久陈嘉庚资金周转不灵,钱没能继续投过来,国学院停办,这些教授也就陆续离开了厦大。张星烺1926年10月16日写给陈垣的信里也说到原因:“据云因校长陈嘉庚下半年来橡皮生意不佳之故也。”张星烺这封信里还说及沈兼士:“兼士先生现已决意回京,不欲再问此事……”张星烺原列为厦大国学丛书第一种(《中西交通征信录》)也担当有所作为,则是为官僚的核心素质。廉是操守,能是才干,二者兼备,尤为难得。明代廖钦正是这样的官员,百姓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拥戴他,《明史·循吏传》也以“廉能称”三字给予高度评价。

廖钦,字敬先,江西吉水人。洪武四年(1371)以才学优等授河内(今河南沁阳市)县丞。他坚持“以忠信导民”,凡事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安危冷暖,急难愁盼,必切己体察,感同身受,其实是在在的努力和言出必行的实效得到了百姓的理解和信任。当时河内县发生了一起税务官员侵吞税款的案件,导致数千百姓被卷入,省府官员闻讯震怒,下令彻查严办,百姓惶恐之下纷纷逃匿于太行山中。官衙遂调集大量人力追捕,由于案情复杂,牵连甚广,导致此案迟迟没有进展。僵局之下,廖钦挺身而出,并立下军令状:“民已逃窜,急之则愈难捕获,不如稍缓时日。请予我期限,若不能成事,愿与百姓同担罪责。”

此番立诺的背后,是对民情的深刻洞察。廖钦深知,百姓逃亡,非本心所愿,而是恐惧驱使下的无奈之举。此时追捕越急,越可能适得其反,将百姓推向更远的深山,甚至逼良为盗。倘若缓一步,给他们留一方转圜的空间,反而能

改任文科教授),3月16日退国学院史学研究教授聘书。然后就辞职,应傅斯年之邀,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职。其间因和也被聘至中大的鲁迅的一些历史上的是非,鲁迅说顾颉刚来他就要辞职,傅斯年则说如果不聘顾颉刚,他自己也要辞职。傅斯年是中大文学院院长,并兼中国文学和史学两个系的主任。校长朱家骅出面作调人,委顾颉刚兼中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先到沪抗收书。大约半年后,10月13日顾颉刚回到广州,同月任中大史学系教授兼主任。此时鲁迅也已在9月离开广州到了上海。

顾颉刚从“小助教”腾空而起做“大教授”,“跳板”是厦门大学文科主任林语堂主持国学研究院给顾颉刚发出的“史学研究教授”聘书。虽然任“史学研究教授”前后不到一年,但没有大学史学教育学历,亦不曾留学东西洋的顾颉刚从此有了“史学教授”的资质,再以后到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兰州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在史学教授聘任的手续上,已经不存在“程序”的障碍了。顾颉刚实现了“教授自由”:不是不做不成史学教授的问题,而是到哪儿做史学教授的问题,而到哪儿做史学教授,主动权也已经操持在顾颉刚自己手里了。顾颉刚结束“小助教”生涯“腾空而起”的1926年,仅34岁。1948年3月,56岁的顾颉刚当选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这应该是他个人学术荣誉上的一个高光时刻了。

不过我们看到顾颉刚助教直升“史学研究教授”时,不可忽略林语堂给出的说明:《古史辨》出版而令顾颉刚“学术地位突高”。顾颉刚早在小助教位子上,已经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看1924年9月,顾颉刚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委会同人的合影,照片里的胡适、徐炳昶、沈兼士、马衡、朱希祖、陈垣都已功成名就或者虽未进入个人学术顶峰但也已成名,助教顾颉刚站在胡适身边,神情坦然,毫无在大教授面前小助教的畏葸缩缩。可知顾颉刚在胡适、沈兼士这些教授的眼里,地位此时已经不同于通常所认定的“助教”了。

顾颉刚辨古史的前因头绪甚多,这儿不说。直接的学术起因,按照顾颉刚后来在《古史辨》第一册里的自序的说法,是1920年秋读了亚东图书馆所出新式标点本《水浒传》中胡适的序,受到启发,此书所述的故事的来历和演变有许多层次,想到以前做戏迷时体验到戏本故事也一个故事有多个演法,又想起这年春天胡适发表的辩论井田之文,于是领悟到,研究古史也尽可能以应用研究故事的方法。这是顾颉刚的自述,我们姑且先相信他。这样接下来有了胡适、顾颉刚来回讨论古书真伪、辨别古书真伪的通信,由胡适介绍又认识钱玄同,并由钱玄同书信往返讨论古书真伪问题,由辨古书真伪而辨古史真伪。1921年1月27日钱玄同致信顾颉刚,主张把辨“伪书”的范围扩大,而及于辨“伪事”,“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这样就把学术目标凝聚到了“古史辨”。

1926年6月11日,朴社出版了顾颉刚编的《古史辨》第一册。第一册收文64篇,有顾颉刚和胡适、钱玄同往返讨论辨“伪书”“伪事”问题的书信,也有切实的古书古史具体问题的研究,作者除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外,还有胡荻人、刘爌葵、丁文江、柳诒徵、魏建功、容庚、王国维、李玄伯等。《古史辨》第一册尚未出版时,1926年2月顾颉刚即已开编《古史辨》第二册,所拟篇目的作者有傅斯年、张荫麟、刘复、马衡、

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郭绍虞等。《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反响。胡适、陆懋德、周予同都著文给予好评。顾颉刚说这书一年里就重印了多次。胡厚宣说至1937年印了19版。《古史辨》到1941年6月陆续续出了七大册,总计收文350篇,325万余字。顾颉刚不只是个人勤勉地做研究,他这个“小助教”组织并领导起了一个史学研究的学派:“古史辨”派。这个学派仿佛新文学运动里的《新青年》杂志,一下子搭中了“时代的脉搏”,让史学中找到了一个学术“井喷”的出口。顾颉刚应该是有“学术领袖”的气度的,他编的《古史辨》第一册里,也收进了对他提出质疑的文章,比如柳诒徵先生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道例》。这是“学术领袖”应有的雅量。做成“学术领袖”,个人资质而言恐怕要有两个基础条件:一个是学术的眼力,能够提得出“大问题”;一个是要有学术上容忍异见的气度。傅斯年也有做“学术领袖”的资质,傅颉刚两人北大读书时曾同住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里说傅斯年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

可惜都有“学术领袖”气质的两人,在1928年春天因为筹办中研院史语所意见不合而“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语见顾颉刚1973年7月日记),顾颉刚说这是傅斯年“以家长作风凌压我”,不过我推测这是顾的事后一面之词也不定,姑且不论。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石破天惊,顾颉刚一举成名,这样才有同年8月林语堂给予的“史学研究教授”的聘书,令顾颉刚自己也大吃一惊。顾颉刚在助教位子上孜孜不倦问学,才有了腾空而起的“资本”。林语堂聘他这个职位,实至名归。

顾颉刚说及,近二三十年,不断有著论出来论证顾颉刚的古史辨思想源自日本汉学界,有的干脆说顾颉刚古史辨抄袭自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的推测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或做助教时就看到北大图书馆1920年代前后入藏的《东洋学报》《汉学》《史学杂志》《东亚研究》等日文报刊里关于中国古史的文章。我想,这个问题也许还可以换一个视角来讨论,即近世中国古史研究的日本学术渊源,不一定要在抄袭与否之类的问题上转圈圈。

顾颉刚助教时期做了很多事,“古史辨”可以说是“1”,其他事都是这个“1”后面的“0”。没有前面的这个“1”,后面所有的“0”大概都只能是“0”。有了前面的这个“1”,后面不断添加的“0”都将增加前面“1”的分量,如虎添翼。顾颉刚从助教直升教授,实现“教授自由”,也是风云际会,套用宋人苏洵的话: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顾颉刚的父亲子虬公,庚子之乱后,光绪三十年(1904)被江苏省考送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今北师大前身)就学,然终因家用乏绝而在第二年春辍学。子虬公深以为憾。顾颉刚中学毕业,子虬公就命他应试北京大学,子虬公说:“吾困于家务半途而废,今汝可无虑此矣。吾之所志将于汝乎成之矣。”子虬公对顾颉刚说自己因为家贫未能完成京师大学堂学业,现在你不必忧虑家务,我的志向将由你来完成矣。子虬公1939年1月8日在苏州去世时,顾颉刚正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教授任上。此时顾颉刚不仅完成了北大的学业,还实现了“教授自由”,做成了一系列的事业,这或许可以告慰子虬公了。

◎ 史林偶拾

## 赵燕侠第一次登台

□ 冯忠方

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第一次登台的故事,非常有趣。

1933年,5岁的赵燕侠随父亲赵筱楼从天津来到武汉。1934年的夏天,赵筱楼在汉口天声戏院搭班唱戏。这时,戏班里没有唱娃娃腔的小演员,凡有小孩戏,都是由一个18岁的青年演员来演,很不合适。适逢上海京剧名旦毛剑秋到此演出,打炮戏是《三娘教子》,可是这出戏里的小东人薛义哥却找不到合适的小演员。老板看到站在身旁的小燕侠,想让她来演这个角色,可是父亲赵筱楼担心其年幼又没有登台的经历,坚决不同意。这时,老板便直接向小燕侠:“你敢不敢上台演戏?”小燕侠满口答应:“那有什么不敢的?”此时父亲不好再反对,于是老板叫一个年纪大的女演员教会了小燕侠扮演小东人薛义哥的出场、台步、身段、戏词、板眼等。

可是,在上演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 陈寅恪的抗战岁月

□ 姚秦川

1937年北平沦陷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陈寅恪被迫离开北平,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历经17天的舟车劳顿,陈寅恪于当年11月20日抵达长沙。稍作休整后,便奔赴“长沙临时大学”,为学生们授课。每天,陈寅恪都穿着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衫,步履沉重地赶往教室。当时,陈寅恪右眼视网膜已脱落,视力急剧减退,每次批改学生作业,他的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面。

1939年,因眼疾日益恶化,陈寅恪暂时离开西南联大,原定远赴英国讲学并接受治疗,却因战事困留香港。其间,时常有人送来米面接济,但陈寅

原老板为防小燕侠不行,叫那位18岁的青年演员也化了妆,以便应急时顶上去。按照程式规定,小东人薛义哥上场时,先要走完一个大圆场再去见老薛保。可是当小燕侠还只走了半个圆场时,就看到她的父母和那个准备顶替她的青年演员在上下场门的两旁看着她。那个青年演员怕她走半个圆场停下来,不停向她摆手,并小声说:“走下去,走下去!”可是小燕侠以为是她要她下来,好让他上去顶替,于是便停了下来,站在台上说:“演得好好的,我干嘛要下去!”观众见她是个稚态可掬的小孩子,不但不怪她,反而还鼓励她演下去。于是小燕侠又重新回到上场门,走完一个大圆场后,去见了老薛保。她那活泼、认真的动作,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从此,小燕侠“包办”了天声戏院的所有孩子戏,为她以后的艺术道路迈出了可喜的坚实的第一步,成就了京剧历史上唯一创造流派的女性艺术家。

恪从未接受来历不明的援助;若对方强留下物资,他便转分给同样艰难度日的邻居们。

在一封写给至交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曾如此自述困境:“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字里行间,彰显其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与诚挚的爱国情怀。

1944年12月,陈寅恪双目彻底失明。然而,他并未因此放弃育人志业,依然以口授与心传相结合的方式,坚持为学生授课解惑,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教育与学术之中。

## 沈从文的眼泪

□ 唐宝民

沈从文研究专家张新颖教授说:“沈从文本来就是感情细腻敏锐的人,流泪是感情表达的一种自然方式;同时他也是个隐忍的人,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压抑、分散或者表达感情。”

1977年,年仅59岁的诗人穆旦去世,沈从文与穆旦交往很深,“得消息时,不禁老泪纵横!”1985年,记者到沈从文家采访,问起“文革”的事,沈从文说:“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女记者听了,便走过去拥着老人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沈从文听完这句话,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啜啜大哭起来,什么也不说,就是不停地哭。后来,还是张兆和走过来,像哄小孩子一样安慰,他才安静下来。

1982年5月,沈从文回故乡凤凰,在家乡听傩堂戏时,听着听着就流泪了,黄永玉做过这样的记述:“一天下午,城里十几位熟人带着锣鼓上院子来唱‘高腔’和‘傩堂’。头一句记得是‘李三娘’,唢呐一响,从文表叔交着腿,双手置膝的静穆起来。‘不信……劳……春……哭、老、人……’听到这里,他和另外几位朋友都哭了。眼镜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他仍然一动不动。”后来生病在家,偶然听到“傩堂”两个字时,他也会默默地流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沈从文的眼泪,既有对弱者的同情,也有对逝去岁月的伤怀和对故去亲友的怀念,更多的则是内心长久委屈的释放。他的眼泪,是一代知识分子在苦难之后内心悲苦的释怀,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真性情的一面。

## 鲁迅集邮

□ 颜士州

青年时代的鲁迅对邮票产生了兴趣。1914年的日记中就有:“六月二十六日晴……得二弟信并旧日本邮票一贴。”1913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有:“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票,可说明他对纪念邮票的热衷。1914年8月2日,日记中又云:“上午访季自求于南通馆,赠以日本邮票十余枚。”这记录了他将收集的一批邮票赠人的事。1929年前后,在苏联工作的曹靖华常常替鲁迅搜集到一些苏联发行的美术明信片,鲁迅十分珍视它们,总是反复玩赏,妥善保存。

繁忙的工作和战斗,使鲁迅先生不能在集邮上花费太多的精力,但对于爱好集邮的友人,他则是尽力给予支持和帮助。著名学者许寿裳是鲁迅

的朋友,鲁迅在杭州任教时,曾备一纸袋,上书“贻上遂”(“上遂”是许寿裳先生的别字)。每当有信寄来,他总要细心察看所贴的邮票,择其优者留存于袋内,按时送给许寿裳。这种支持和帮助,到晚年仍未中辍(见之于《鲁迅日记》)。

对自己的孩子海婴,鲁迅先生也十分注意培养他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据许广平回忆,海婴六七岁时忽然想收集邮票,鲁迅就从海外寄木刻图片来的有关英、法、德、日本等国的邮票中,选取一部分给给他,自然,也将一些便于搜寻的中国邮票给他,而更多的则是苏联邮票。那时,苏联刚度过经济困难时期,鲁迅和萧三、曹靖华等友人通信得来的邮票并不是现在所看到的那种质地精良、印刷优美的邮票,而是一种在粗糙纸张上仓促印成的东西,仅仅作为邮局通行的印证而已。越是这样,在鲁迅看来,却更加觉得宝贵。

## 廖钦:“廉能称”的循吏

◎ 烛映青简 □ 马军

古人云:“廉者,政之本也。”意思就是在诱惑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守住心、守住手、守住清白,不做不该做的事,这是立身为官的根本和底线。而有智慧、有担当、有所作为,则是为官者的核心素质。廉是操守,能是才干,二者兼备,尤为难得。明代廖钦正是这样的官员,百姓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拥戴他,《明史·循吏传》也以“廉能称”三字给予高度评价。

廖钦,字敬先,江西吉水人。洪武四年(1371)以才学优等授河内(今河南沁阳市)县丞。他坚持“以忠信导民”,凡事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安危冷暖,急难愁盼,必切己体察,感同身受,其实是在在的努力和言出必行的实效得到了百姓的理解和信任。当时河内县发生了一起税务官员侵吞税款的案件,导致数千百姓被卷入,省府官员闻讯震怒,下令彻查严办,百姓惶恐之下纷纷逃匿于太行山中。官衙遂调集大量人力追捕,由于案情复杂,牵连甚广,导致此案迟迟没有进展。僵局之下,廖钦挺身而出,并立下军令状:“民已逃窜,急之则愈难捕获,不如稍缓时日。请予我期限,若不能成事,愿与百姓同担罪责。”

此番立诺的背后,是对民情的深刻洞察。廖钦深知,百姓逃亡,非本心所愿,而是恐惧驱使下的无奈之举。此时追捕越急,越可能适得其反,将百姓推向更远的深山,甚至逼良为盗。倘若缓一步,给他们留一方转圜的空间,反而能

事半功倍地解决问题。

得到上司的首肯后,廖钦并未急于直奔主题,而是曲径通幽,首先对一团乱麻的侵税案情条分缕析,八方核对,在此基础上,将涉案者姓名、具体数额以及其中隐情逐一查清查实,然后张榜公布。同时,暗中派人向有关人等讲清政策,打消疑虑,并代表官府郑重承诺:就事论事,既往不咎。逃亡的百姓听说有说话算数的廖县丞担保,心里顿时踏实不少,遂纷纷走出山林,各想办法,亡羊补牢。因此,期限还没到,拖欠的税款便补缴完毕。这样的圆满结果令督阵的省府官员惊喜非常,不仅摆酒慰劳廖钦,还赋诗一首夸他是奇才、干才、俊才,总之一句话,这件事他干得漂亮。廖钦借此机会请求说:“钱既足,民得无罪乎?”心情大好的省府官员一口答应,廖钦又说:“何不许其自首?”在廖钦的恳挚申请和奔走斡旋下,省府终于允许百姓自首从宽,致使数千百姓免于牢狱之灾。至此,沸沸扬扬的侵吞税款案圆满解决。而其他郡县则没有这么幸运了,被枷锁押送的犯人,在路上络绎不绝。百姓纷纷慨叹说:“如果没有廖公,我们恐怕也会像这样吧!”

多年后,廖钦回乡路过曾经任职的河内县。虽岁月沧桑,风华不再,但百姓还是一眼认出他来,争相围拢上前,亲热地惊叫道:“是我昔人廖父也!”廖钦不愿惊动百姓,连连摇头摆手,谎称自己只是个过路的商人,并非昔日的县丞。但百姓对他的一举一动、一点一滴,记忆太深刻了,特别是刻在骨子里的那股浩然正气,除

了当年那个与他们同甘共苦的父母官,还会是谁呢?

在这些淳朴可爱的百姓面前,廖钦实在无法继续隐瞒,只得接受百姓发自内心的敬意。他们纷纷从家里拿来酒肴,围坐在他周围,嘘寒问暖,说不尽的感激之情。次日,百姓又各自携带细绢前来馈赠,不一会儿便堆积数百匹。廖钦坚决推辞,百姓至诚相送,恳求不已:“您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一直没有报答。万幸您今天终于来到我们家门口了,这就是天意啊!恳请您收下我们的这点心意吧。”可是廖钦仍然坚辞不受,他说:“诸位过奖了,我哪有什么恩德,当初所做,皆是职责所在。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你们的美意我全都领受,但是一尘不染是我坚守一辈子的道德与初心。诸位这么感念我,那何不助我坚守初心和德行呢?倘若我接受了这些馈赠,那么昔日所作所为便毫无疑问统统成了放长线钓大鱼,以图今日之利的肮脏龌龊之举,我岂能为之?”这番肺腑之言,字字如有千钧重。廖钦不是不需要钱,他一生清贫,晚年更是困顿,但他更在意的是自己一生坚守的“廉”字不能在最后一刻失守,所以宁可辜负百姓的好意,也不能玷污自己的初心。廖钦深知无法推脱,便在一夜悄然离去,不带走一丝一毫,只留下一个山高水长的背影。

这个背影,比任何政绩都更能彰显他的人格魅力,同时也是“廉”字最深刻、最完美的注脚。



1985年,杭州市食品公司工会干部在笕桥机场前合影。

照片提供者:江新诗

◎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